我在北大六十年

——陈哲夫自述

陈哲夫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前　言

记得有一天，朋友和我在一起聊天，他们说我这一生从20多岁就进入了北京大学，到目前为止，垂垂60年矣。他们认为我在这60年中，经历丰富，有过欢笑，也有过痛苦；有过吹面不寒杨柳风，也有过风刀霜剑严相逼；做过被人尊重的人民教师，也做过不可接触的贱民；有过宾朋满座的盛况，也有过门可罗雀的悲惨。在这种荣辱变幻不测的风风雨雨中，有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，如果写出来可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生活的经验和教训。

我想是的，这几十年的生活经历，的确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录下来。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记录下来呢？

第一，走大路，也要准备走小路。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，人都希望走阳关大道，但却常常碰上崎岖小路。走在阳关大道上，自然可以满怀信心、毫无顾忌、大步挺胸地走去。但也应该记住，你也要有走艰难险阻小路的思想准备，当你一旦走在艰难险阻的小道时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冷静地分析形势，坚定信心，切不可悲观失望地走上绝路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许多人的人生经历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。

第二，不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。人都希望上进，但上进要通过正当的途径，切不可利令智昏，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“四人帮”之流，为了扩大其党羽，采取“贫者富之，贱者贵之”的策略，用封官加爵的手段招兵买马，于是有不少贪利之徒投靠那些野心家，跟着他们丧心病狂地干尽坏事。于是，确有不少人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，一下子成了暴发户。在一个短时期内，他们身居高位，八面威风，前呼后拥，颐指气使。由于他们是非正义

的、反人民的，最终仍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。十年之内历史来了个大转弯，把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。那些表面看起来的庞然大物，一下子成了阶下囚。王洪文、张春桥、陈伯达、姚文元、关锋、戚本禹、马天水……之流，就是这样一些投机分子。他们想踩着别人的肩膀爬到天上去，想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。想当年他们震天动地，叱咤风云，呼风唤雨，何其雄也，而在几年之后，束手就擒，被投之囹圄，又何其悲也！他们的兴衰荣辱，是一面最好的镜子。

第三，做一个大写的人，即做一个正直的人。所谓正直的人，就是不唯利是图，不做损人利己的事。一个正直的人，即使是处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，也要不为利诱，不为威服，堂堂正正，凭自己的良知做事。在那个疯狂的年代，一些丧心病狂的人，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经常用小恩小惠的办法，或用威胁的办法，要你为他们的罪恶目的做证明，许多人在他们的利诱和威胁之下为他们的罪恶目的做了证明。在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罪恶活动中，就有许多人为了救出自己，不惜昧着良心，对刘少奇落井下石。但也有人有浩然正气，威武不屈，贫贱不移，顶住压力，说实话，不说假话。周扬曾十分错误地整过胡风，“文革”中，周扬落难，整周扬的人希望胡风借机报仇，他们要胡风起来揭发周扬，而胡风虽身在囹圄，却凛然正气，不肯落井下石，让他们失望了。张闻天，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，因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“左”倾错误，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分子，在“文革”中，他再次落难，被批判斗争，造反派逼迫他诬陷刘少奇。张闻天光明磊落，堂堂做人，实事求是，无一字伤及刘少奇。

第四，十年“文革”历史告诉人们，正义必然战胜邪恶。“文革”是一场浩劫，“文革”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，邪气十足，他们在迫害人的时候，读的是语录，用语录给自己壮胆；他们发狂的时候唱语录歌，表示自己的胜利；他们出去“杀人”，要早请示；打、砸、抢回来，要晚汇报；他们怪模怪样地跳忠字舞。在20世纪人类文明高度发展

的时期却出现如此愚昧的行为，真叫人不可思议。这种邪恶不灭，天理不容。

第五，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中国历史上这一令人伤心的年代。“文革”十年，中国有二千万人死于非命，有上亿人被践踏，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，下至中国的平民百姓。中国有两句成语，“前事不忘，后世之师”，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，这是说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可供人明辨是非，衡量得失，权衡轻重，通晓古今。不能认为某些大人物是天生圣哲，他们的知识、见识、智慧主要是从读书得来的，通过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圣哲们做人、做事、治国、安天下的教诲，和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后，从无知到有知，从愚昧到文明。从执政者来说，熟悉“文革”全过程，总结“文革”经验教训，是一种很好的学习，是提高执政能力之必要；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。

在谈了我的人生的经验教训之后，也要谈谈我的教学与治学的心得，亦即我的学术思想和活动。

我这一生的职业是教师。从小算得上好学，坚持不懈地努力求学，终于当上了北大教师。本来教学与治学是我的本分工作，可惜受到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冲击，几十年大好年华被浪费掉了。何止浪费掉了，简直备受摧残！真正教学与研究占用的时间有限，这是我一生很大的遗憾。好在我挺过来了，还有机会做教师工作，尽管时间不多。回想起来，我对于自己的教学与治学是不满意的，因为本来我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一些，但这是时代造成的，我没有办法改变它。不过，我既是教师，多少也有教学与治学的点滴体会，也在有关章节中把它们写出来，或许也会对后来的教师同行们有点参考价值吧。

我在第一至第三章写了我的求学与初为教师的工作情况，我觉得爱好读书学习是一种美德，对人是大有益处的，作为教师则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，才可以做好教学工作。当你作为教师时，对学生

认真负责就是必须的师德，我自觉我是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。

第八章中我回顾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，它使我在社教运动之初就受到批判，那时我没有向错误地批判我的人低头，而且我至今仍认为我的论文是成功的。我认为学术研究就是要探求事情的真相，而不能受政治的影响，随政治气候而变化，否则，那不是学术而是骗术。

从第四到第十一章，主要记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。其中我特别注意记录历史和思想史的资料。我是研究思想史的，我写回忆，是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写的，而不仅仅是记录我的个人经历。以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写回忆，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启迪后人，是有好处的，也是有必要的。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来认识我们国家的这一段历史，能够让后人更好地研究历史，认识历史。这是我写作的基本态度。

我在第十一章最后两节中，还有第十二章的某些节里，也对我国的那一段历史作了自己的分析，希望能对研究者有参考价值。

在第十三章里，我比较集中地讲了我的学术活动，包括教学与研究工作，还包括出境访问、讲学、交流。

在这本书里，我多次谈到自己的政治观点，这有我一生的经历作为基础，也有我一生的学习与思考作为基础，是经过严肃认真反思的结果，而不是跟随政治风向随时可以改变的。经过了多次的政治运动，我在学术研究上，就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，批判极“左”思潮，宣扬民主主义这几个方面。我努力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以一个严肃认真的学者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热爱自己的国家，也够得上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，我做学术研究，就是认真地研究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，认真地研究我国的现实政治问题，真诚地为我们党和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。希望我的政治观点能够为较多的人所接受，能够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起一点作用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在北大是一个小人物，只生活在一个院系里，

对北大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，我所写的东西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亲眼看到的，只有个别事情是我听到的。在我写听到的事情之前，都亲身去作过调查核实。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，个人的记忆不能保证都绝对正确无误，个别事情的个别情节如果有误，请批评指正。

目　　录

第一章　来北大以前 / 12
一、家世 / 12
二、兵荒马乱的年代 / 13
三、读书过程中的曲曲折折 / 19
四、雄心勃勃考北大，两次名落孙山 / 24

第二章　我考取了北京大学 / 28
一、考取了北大，来到了北大 / 28
二、学习和生活 / 30
三、思想改造运动 / 32
四、去江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/ 34

第三章　我当了教师 / 38
一、当了教师以后 / 38
二、教学生活回眸 / 40
三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/ 41
四、在工农速成中学 / 43

第四章　北京大学的 1957 年 / 45

一、中共北京大学的整风 / 45
二、北京大学的反右派斗争 / 60
三、我在 1957 年 / 67

第五章　1958 年的“大跃进” / 71
一、去保定参观“大跃进” / 71
二、门头沟劳动锻炼 / 74
三、我们怎样“大跃进”？ / 83

第六章　北京大学的反右倾运动 / 85
一、“大跃进”后的中国社会 / 85
二、北京大学的反右倾运动 / 90
三、我参加了对马寅初的批判大会 / 96
四、1960 年，我倒霉的开始 / 100

第七章　我在 1961～1962 年 / 103
一、饥饿之年 / 103
二、我回到了河南老家 / 107
三、从河南老家回到北京大学 / 110

第八章　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 / 112
一、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背景和序幕 / 112
二、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 / 127
三、国际饭店会议，纠正了“左”的错误 / 133

第九章　满怀辛酸话“文革”（上） / 137
一、山雨欲来风满楼 / 137
二、黑云压城城欲摧 / 143

三、风刀霜剑严相逼 / 150
四、我在北大两大派斗争的日子里 / 166
五、我目睹了斗争彭真和宋硕 / 170
六、母亲之死 / 173

第十章　满怀辛酸话“文革”(中) / 178
一、十三陵的迫害狂 / 178
二、“黑帮大院”的血泪 / 181
三、“黑帮大院”暴露出来的人性 / 181

第十一章　满怀辛酸话“文革”(下) / 196
一、“黑帮大院”解散,我被囚禁在 39 楼 / 196
二、我被放出了 39 楼,通过了党员登记 / 201
三、江西“劳改”,鲤鱼洲种地 / 203
四、返回北大,做了一年勤杂工 / 225
五、黎明前的黑暗 / 228

第十二章　历史的转折 / 240
一、1976 年 10 月 7 日的凌晨 / 240
二、“文化大革命”给北京大学带来了什么 / 242
三、劫后人语 / 246
四、政治黑风袭击下的众生相 / 257

第十三章　人民的春天来了 / 268
一、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 / 268
二、举国欢腾庆胜利,批判“四人帮”的罪行 / 268
三、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 / 276
四、我被平了反 / 279

第十四章　我的新生与学术活动 / 282
一、我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/ 282
二、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/ 285
三、我当了国际政治系的副主任 / 288
四、我的教学生涯 / 291
五、我的学术活动 / 300
六、走出国门，交流学术 / 307

第十五章　在 80 年代的政治风云里 / 323
一、我参加了一次研讨会 / 323
二、不断的学潮和 89 年的政治风波 / 327

第十六章　夕阳无限好，平安度晚年 / 331
一、退休逢盛世，养生有妙诀 / 331
二、弄孙为乐 / 334
三、我还要做点事，不能坐着等死 / 336
四、丧妻之痛 / 338

结束语 / 344

后　记 / 348

第一章
来北大以前

一、家世

我在北京大学60年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，同我个人的性格、经历和家庭环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在写我在北大60年的前面，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来北大以前的情况。

1923年4月8日，我出生在河南省临颍县县城东南30里的研岗村。这是一个不大的村落，这个村向东一里多路是西华县，向南四五里路是郾城县，处在临、西、郾的交界处，距离3个县城都比较远，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。村子里没有几个读书人，只有一个人在临颍县城教过高级小学。在这个村里，当时住有一百多户人家。不管是地主、富农，还是贫农，都是种地人，只是参加体力劳动的多少有不同而已。有做小本买卖的，在村子里卖点日用小杂货。他们都是穷人，够不上商人的资格。

我的祖父陈焕章(1866～1951.12.25)，念过几年书，读的是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。他完全不懂那些书中所包含内容的意思，也不会写哪怕是很简单的文章，他的文化程度只能记个账什么的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陈国平(1888～1949.12.14)，二儿子陈国忠，是一个大家庭。1927年，他们分了家，陈国平和陈国忠成了两家人。

我的父亲陈国平，是个目不识丁的人。由于目不识丁，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，他不会记账，同人家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，只能用豆子的粒数当他的账本。他种西瓜，每年要留瓜种，只能用一个红布袋装红瓤西瓜子，用白布袋装白瓤西瓜子。他是个庄稼人，一生种地，是个劳动的好手，他的劳动很出名。由于过度的劳动，他60岁就去世了。在很长的时期内，他就我一个男孩，却有5个女孩，在旧社会，女孩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，我因为爱读书，没有更多的时间参加田间劳动，劳动的任务就落在父亲一人身上。家里虽然也雇了一个长工，但他仍需担负很重的体力劳动。由于没有人帮他干活，他在家里喜怒无常，动不动就骂人，我对他没有好印象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发脾气也是有来由的，我不应该埋怨他。我从呱呱坠地一个毛头小孩，变成今天一个大学教授，如果没有他的呵护是不可能的。

二、兵荒马乱的年代

1. 逃难到异乡

从我出生的1923年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都是兵荒马乱的岁月。在我7岁那年的1930年，正是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中原大战，河南省成为一个大战场。当时我一个小孩子，当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打仗，也不了解他们军队的番号，脑子里只有北兵和南兵的概念。现在想起来，南兵大概是蒋介石的军队，北兵大概是阎、冯的军队。不管是北兵还是南兵，都有自己的正规军和杂牌军。正规军一般还有点纪律，杂牌军就是亦兵亦匪了。我记得有一股军队驻扎在我们村里，现在我也记不起来他们是南兵还是北兵，据称他们的头目叫王老五，原是豫西的土匪，后来被国民党收编，但匪性不改，是亦兵亦匪的队伍。开始他们还有点纪律，过了不久就开始在村子里绑起票来了。我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在一个黑

漆漆的夜里，把我背到匪兵疏于防守的一段寨墙上，用绳子拴住我的腰缒到寨墙下面，然后，他也跳下寨墙，背着我从护寨河里游到河对岸，踏着夜色跑到另一个叫作贾太石的村子里，在那个村子里住了 40 多天。贾太石是一个同研岗村大小差不多的村子，但这个村子里的居民性格要强悍得多，他们团结，有组织，也有自己的寨墙，他们加强防守，拒绝匪兵进入他们村子里。这股匪兵只有步枪，没有大炮，进不了村子。在一次交战中，村民无恙，匪兵却被打死了几个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我这个已经 7 岁并且懂事的孩子，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地过日子，生怕匪兵杀入村子，遭受迫害。所幸这股匪兵竟没有能进入这个村子，我们有惊无险。

2. 深夜脱虎口

1933 年阴历 9 月，那时候我 10 周岁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，送我到一个叫作七里仓的村子里读高级小学。这个村子距离我住的村子大概有 2 里路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读高小的程度。在此以前，我是在一个极为落后的小学校里上学，学校里的几任教师，都识字不多，更缺乏现代科学知识，他们只有极简单的数学知识，只会加法和减法，连先乘除后加减、大中小括弧运算都不会。老师如此，学生更不必说了。我读高小，完全是不合格的，每天上课，毫无兴趣，只是苦恼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一场匪灾从天而降，我也几乎丧命。

在开学后半个月的时候，阴历 9 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大概是三更天，我正在熟睡，忽然被什么东西惊醒了。睁开眼睛一看，同房间睡觉的 20 来个同学，一个也不见了，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，放着暗淡的光。窗子外一阵阵啪啪的枪声和冲天的火光。枪声是从村子的东头传来的。身处乱世的孩子比较敏感，知道是有土匪进到村子里来了。他们大概是从村子东端的寨墙上爬进来的。我十分惊慌，马上穿上衣服，从床上跳下来，慌忙中，裤腰带也找不到了，用

手提着裤子，跑出学校大门外。跑到哪里去呢？我没了主意，看见眼前有一片甘蔗园，无奈中，就钻进甘蔗园里躲避。枪声越来越近，我感到天亮之后，这里无论如何是藏不住人的，于是就从甘蔗园里钻出来，向着西面的寨墙跑去。从甘蔗园距离寨墙大约有500米的光景，这里是一片坟墓，杂草丛生，荆棘满地。在这里往前跑，几乎跑几步就要跌一跤。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，我终于跑到寨墙边。当我爬上寨墙之后，土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学校，他们的手电筒光一闪一闪的，令人胆战心惊。此时此刻，我幼小的心灵斗争激烈：被土匪抓住，要花很多钱，会导致倾家荡产，甚至会丢掉生命；如果要从四丈高的墙上跳下去，也可能会丢掉生命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心跳墙下去。当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往下跳的时候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只无奈地叫了一声："我的娘呀！"随着叫声，我落地了。我没有死，也没有受伤。虽然跳下了寨墙，但寨墙下还有护寨河。深秋季节，河水正旺，至少有一丈多深，当时我也不会游泳，跳下去就会丧命。这时候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拼着命跳下了河。我以为这次是必死无疑了。然而，上帝保佑，我竟莫名其妙地游到了河对岸。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，我是怎样游到河对岸的。过了护寨河，走了100多米，还有一条河，这条河的水不深，我趟水过了河。深秋天气，已经相当冷了。我穿着全身湿透的夹衣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几乎走不成路了。

天依然漆黑，我东西南北莫辨，我冷、我怕、我有点昏迷，我不知道何处是我的家乡，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走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有一个早晨起来捡粪的老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人，在我迷路的时候，他给我指出了路。这样，我很快就到了我的村子——研岗村。当我回到研岗村时，我的父母正在村头抱头痛哭。可他们一看到儿子平安地回来，马上破涕为笑了。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大难不死。

这股土匪据说有两千多人，匪首名叫王佑，在若干年后我在一

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称:“豫西巨匪王佑伏法。”这伙土匪心狠手辣、恶贯满盈,他们在村子里,烧杀奸淫、掳掠抢劫、无恶不作,不知道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,不知道有多少财产被他们劫走。在这次匪灾中,我的同学中有几十人被土匪绑走,他们中有不少人花了很多钱才被赎回来,有的竟被撕了票,也有人在跳寨墙逃跑时摔死。和我同村的有两人,一个叫吕凤馨,年长我 8 岁,一个叫吕瑞祥,年长我 4 岁,他们俩都不幸被土匪绑走了,都是在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并花了很多钱后,才被赎回来的。我一个 10 岁的孩子脱险出来,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奇迹,在附近的村子里出了名。土匪走后,我回到学校取行李,一个老师看见我,十分惊讶地说:“啊,你也跑出去了! 真是该不该呀!”(该不该,河南方言,“注定不该出事”的意思)这次匪劫之后,这个小学停办了两年,也许是被吓坏了。我也害了将近半年的大病。

3. 日犯郑州,夤夜出逃

1938 年 9 月,我在郑州桐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。开学不到半个月,还没有正式上课,日本侵略军就进犯郑州,首先派几十架飞机对郑州狂轰滥炸。有一天早晨,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。我和同学们一起披上衣服就跑,躲在乡下的农田里。敌机在郑州城区及其周边轰炸了一天,飞机一批又一批飞临郑州,一阵阵炮弹轰响,浓重的烟雾遮蔽了郑州。飞机在郑州上空盘旋,就像在我的头上盘旋,炮弹、炸弹的轰响,就像在我身边轰响,这情景可怕之极,也危险之极,我想这次可在劫难逃了,十分幸运,炸弹竟没有落在我的身边。我又活下来了。我在田野里提心吊胆地躲了一天,连一口水也没有喝、一粒米也没有吃。天黑后,警报解除了,我回到了学校,到宿舍一看,宿舍里空空如也,一个人也没有,学生们都逃走了。看到这种情景,我一切都明白了:日军要进城了。我紧张、害怕、慌乱,肚子又饿,可我顾不了了,卷起被褥就跑出学校,一口气跑了 18 里。跑到农村一

个小食店里，弄了点吃的东西。之后，一眼未眨，又跑了一夜，几天后，我回到了家里。

4. 出逃沦陷区失败，钱物被洗劫一空

1943 年，我到豫东游击区周口联合中学读书。刚读一年，1944 年 5 月，日寇又在豫东发起进攻，周口沦陷，我又跑回家乡。不久，我的家乡临颍也沦陷了，我被围困在沦陷区。

1945 年春天，为了不做亡国奴，我和两位同学（一个叫关琏，一个叫王陆军）一起，装扮成商人，用架子车拉了一车香烟，意图逃出沦陷区，前往国统区的西安考大学。此时，通往西安的铁路因抗战的需要已被拆除，火车不能通行。要到达西安，就要经过很长的敌占区。通过这样的地区，非常危险，这里不但有日寇的各种哨卡，而且还有出没无常的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，还有我党的地方武装。当时我们最害怕的是日寇，他们一般把守在要道通衢。为了避开他们，我们尽可能地走小路。走小路经常碰到的是半兵半匪的国民党游击队，他们打着抗日的名义，实际上干着劫匪的勾当。我们几次被他们抓起来，说怀疑我们是共产党，把我们抓到山上，用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，经过几次审讯，找不到什么证据，就把我们放了。一路上，我们时不时地被人拦截，他们把我们身上搜遍，甚至连我们的鞋子也要用手折几折，希望能在其中找出金条来。经过艰难跋涉，我们到达了河南洛阳之西的观音堂。此时日寇在风陵渡发动进攻，去西安的路被堵塞。无奈，我们只好又返回故乡。在路上，我们所带的路费、衣物被国民党匪兵洗劫一空。我们三人只剩下三条命。

5. 高考途中，遭遇劫匪

1945 年 8 月，抗日战争胜利，我到一个小学里去教书。1946 年 7 月，我去武汉考学，在从临颍去漯河的路上，碰上了一个国民党军

官总队的军官，他用枪口对准我的脑袋，抢走了我携带的全部路费。无可奈何，我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程百让。程百让原是周口联中的校长，日本投降后，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郾城中学校长。程百让校长资助了我一笔前去武汉考学的路费。这次高考我虽然失利了，但是我念念不忘程校长的恩情。不久，解放战争在河南打响，我同程校长失去了联系，这笔钱我始终没有还上。很久以后我才听说，解放以后他曾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过洛阳市市长，后来又到了郑州大学，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，自杀身死。每想到程百让校长，我总是不胜伤感，不胜愧疚。

总之，从出生到成年，我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，经过生死渡，又过鬼门关，可谓大难不死。这些灾难，给了我说不完的痛苦，同时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性格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年代里，我是北京大学教师中受折磨、受迫害最为严重的人之一。然而，我却没有走上绝路，我活过来了。我想，这也许因为我是经过多次生死考验的缘故。

三、读书过程中的曲曲折折

1. 曲折的小学生活

我 7 岁上学。我们村这个小学，可以说是个十分落后、破败不堪的学校。学校只有三间破屋子，能容纳 20 多人。最可怜的是所请来的老师，文化水平都不高，他们可能读过一点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，没有或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，譬如说，他们连算术都不会，最多只懂得一点加减法，而不懂乘除法，更不懂四则运算。有的老师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，干脆要我们读《四书》。在这样的学校里，我们根本学不到现代科学知识，而只是学会了一些汉字。在我们同学当中，我认得的汉字是最多的，也是记得最牢的。所以，也最受老师